

谈数

早来枣好

李绍增

在“中国·乐陵金丝小枣节”上,火了一句文旅广告语:“早来枣好。”

你看啊,活动的主幕墙上,“早来枣好”八个黄色隶体大字磁石般地吸引着众人的眼光;场地上空五彩气球飘动的缎带上,“早来枣好”借着秋阳闪亮放光;参加活动的人们手中摆动的旗子上,“早来枣好”传递着相互的问候和祝福。就连枣林里相遇和欢送宾客离去,也是一句“咱们‘早来枣好’啊”“来年还会‘早来枣好’啊”。小枣节曲终人散了,“早来枣好”竟跃上了交通要道的巨型广告牌,挂上了大小商场店铺的门楣,颇显几分壮美和惊艳。

乐陵是闻名中外的“金丝小枣之乡”,在这块遍布枣林的土地上,“中国·乐陵金丝小枣节”,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举办了几十届,曾经使用过“开放的乐陵欢迎您”“金丝枣乡等您来”“枣林风景美如画,乐陵小枣甲天下”“相聚枣乡乐陵,共享美好未来”等文旅广告语,因为太过“大路化”且缺少文化魅力和感情色彩而如过眼烟云,随着节终人散飘走了。

天无绝人之路。决策者们拍板,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旅广告语,以服务和助力枣乡拓展文化旅游的战略。一时间,上千封征集信件像上千只信鸽飞出去又飞回来,洋洋洒洒的佳词金句,摆在了由文字、旅游专家学者和在长在枣乡的智者达人等组成的专班的办公桌上,经过千挑万选,“早来枣好”“游生态乐陵,赏千年古树,品人间圣果——枣乡乐陵欢迎您”“金丝小枣熟了,我在乐陵等您”“品乐陵小枣,赴金秋之约”等10条,如同选美场上胜出的佳丽,亭亭玉立闪亮登场了,又如站立在新夏小荷上的蜻蜓,露出了鲜艳的头角。又经专班人员千琢磨万讨论,“早来枣好”坐上了“头名状元”的金交椅。

“早来枣好”,释放出中国文字特有的魅力和张力。”老家举行确定文旅广告语“头名状元”汇报会,我忝列其中,亲耳聆听过坐在专班评委“头名交椅”上、力推这篇文旅广告语为“头名状元”的省城济南某所大学文学院的牟教授的侃侃而谈——

根据中国汉字创构遵循的形象、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书”原则,所形成每一个文字,都有自己的本义和引申义,按照约定俗成组合成词、成句、成章,它们的本义和引申义便释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张力,如果再运用“隐喻”“通假”“双关”等修辞方法,将某些同韵同声单字,巧妙地组合一起,其字义的奇妙更会随之得到放大,给人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就以“早来枣好”这一语为例,一看到它,就被它承载的这种神奇魅力所吸引、所折服,可以说先是眼睛一亮,继而内心一振。这“头名状元”非它莫属!

“不是我哗众取宠,实在是此句实至名归!”牟教授爽朗地一笑,继续发言——作为一条文旅广告语,除了文字层面的魅力之外,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这其一,有特色。一地的文旅广告语必须含有一地的特色。否则,文字再精美,也难当此任,只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乐陵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自然是始于商周、兴于魏晋、盛于明清的枣林,可以说,提起“枣”来,尤其是“枣好”来,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乐陵。所以,不含“枣”字,难以称其为乐陵的文旅广告语。“早来枣好”四个好说好听、朗朗上口的字,结结实实地承担起这种功能。这其二,有实情。乐陵小枣的成熟时节在农历的中元节至中秋节前后,抢在这个时段来旅游观光,就能领略到枣林“千家小枣射金红”(清诗人吴泰庞诗句)的高光风景。如来晚了,可就只能在“枣落叶黄”的残照中哀叹了。

“早来枣好”,不装腔作势地取宠、不云里雾里地惑人,真实地把这一实情传递出去,堪称文旅广告语中的高标。这其三,有温度。绝好的文旅广告语不仅要把自己直白明了地推介出去,还必须具备被人感知的温馨和温情。“早来枣好”中的“枣”字,很好地借用了“早”字的谐音,变成了一个“双关字”。这样,对主人说来,向远方的来客传递的是祝福——“早来枣乡观光,早享身体好、精神好、运气好”。对来客来说,它释放的是——“早来枣乡观光早好”的向往”。教授语音刚落,掌声骤然响起。

“‘早来枣好’蕴含着枣乡特定的传统语俗文化。”在小枣节活动现场,我碰到了这一文旅广告语的首席创意者、乐陵市委宣传部的李副部长,我们俩曾前后脚在本地做过新闻报道工作,彼此十分熟悉,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问他这个创意是如何生发出来的,这位土生土长在枣林里的本地汉子,用非常质朴的语气告诉我:

“你知道,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咱们枣树底下长大的枣乡人说起话来,许多时候把‘枣’赋予‘早’的寓意。比如,儿子结婚,父母挑出又大又红的枣撒在新人的被褥上,掖在新人的枕头底下,并故意放开嗓门大声一问一答:‘老婆子你这是干啥?’‘让他们早生贵子啊!’再比如,家里有人要出远门,亲人们忘不了给远行的人装上一把大枣,随时提醒他早去早归。在我们的老辈子时候,枣乡人看望生病的亲人,枣发糕、枣馒头等食品是少不了的,见面后边递给病人吃边说着‘枣’(早)好啊的话。一条好的文旅广告语,不仅要有文字的风采,也得有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用好咱们枣乡人‘枣’与‘早’含义互换这一传统语俗文化,不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吗。于是,‘早来枣好’就应运而生了。”

在一片“早来枣好”的祝福说笑声中,一批接一批的宾客走进了枣林,又走出了枣林,“早来枣好”也像借风腾起的花种,飘落到四面八方。待到来年秋风起,它们结出的芬芳又会飘回枣林,弥漫整个枣乡乐陵。

动,抗战时期到达延安,后赴莫斯科学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落实政策后来到曲师任党委书记。十年动乱结束后,王路宾书记要求从平反的人员中,找有大学问的人并请到学校任教,不拘一格招贤纳士,一时名师荟萃。1979年底,王路宾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还把刚刚平反的张元勋推荐到曲师来工作。

我们在校的时候,赵紫生任院长。赵紫生院长也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元老,20世纪30年代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参加地下工作,曾任鱼台城防副司令,接力铁道游击队,亲自护送刘少奇同志穿越日军岗哨和敌占区。他组织编写的《公社数学》曾受到毛主席赞扬。

在我们毕业的那年,赵紫生院长离休,程汉邦同志接任。程校长本身就是一位名师,曾任政治系主任,讲课生动,幽默风趣,把枯燥深奥的哲学讲成了深受欢迎的语言艺术。是著名的“程铁嘴”。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将曲阜师范学院升格为曲阜师范大学,我们的毕业证上还盖着他的大印。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印章盖倒了,还乐呵呵地说:“你说俺这个熊掌怎么还能倒着盖呢?被打倒的人的名字才要倒着写。”嬉笑之下,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尴尬。程校长平易近人,其千金是我们班同组同学。我们到尼山春游的自行车,就是借的程校长的座驾。

曲园名师多,名师出高徒。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曲师的奇研率就名列前茅。其实,曲师并不只是在考研方面一骑绝尘,在各种专业考试、就业考试等方面也是声名显赫。这与圣地图书馆文化底蕴和浓厚学风是密不可分的。著名科学家王恩多院士、薛其坤院士自不必说,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欧洲科学院院士徐泽水、国际计算机学会会士方玉光等都是本校培养的研究生。

由于曲师远离城市的浮华,四周与农田为邻、村庄为伴,师生们心无旁骛,专心治学,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形成了“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校训,养成了朴实好学的校风,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色。七十载春华秋实,曲园桃李遍天下,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不少杰出校友,为国家社会作出了应有贡献。恰逢曲师70周年校庆,谨以此文贺母校华诞。

曲园名师多

齐鲁

阜城里下馆子买个烧鸡改善一下生活,剩下的就顺手放在口袋里。有一次上课时,老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下,却写不出字来,原来是一根鸡腿骨,同学们忍不住哄堂大笑。

陶先生不拘小节,但治学严谨。在农场劳动期间,用小生演草本偷偷写就300多万字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填补了国内教育史方面的一项空白,引起教育史学界的轰动。

陶先生虽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高足杨启亮给我们讲授教育学,论辈分陶先生是祖师。杨启亮老师未曾上过大学,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陶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起课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娓娓动听,深受同学们欢迎,我们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陶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教育思想。

当时,学校还有一位邵品琮先生也很有名,20世纪5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与陈景润、潘承洞等一起师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毕业后,执教于中科大,后被调来曲师。邵先生长期致力数论和运筹学研究,解答了关于艾多士除数性质的猜想、卡特院士关于数论函数值分布反问题的猜想,改进了华罗庚三角和基本定理,与陈景润合著数论相关著作,成为有影响的数学家,奠定了曲师数学力压群雄的基础。

邵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只聆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次演讲是在操场南边的林荫大道上,邵先生声音洪亮,语言生动,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他说,当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发现图书馆竟无人看管,就好奇地想试验一下,偷偷地拿了本书,走到门口时被电子监控器发现报警,解释半天方才脱身。还有一次到超市,发现有青岛啤酒,就好奇地拿起一瓶看看,不小心碰倒一片。没想到,经理走过来客气地说:“先生,对不起,让您受惊了!”这次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曲师还走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科学家王恩多院士,出身于诸城相州的名门望族,196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曲师化学系。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曲师任教。我和王老师

是同乡,她和蔼可亲,说话自然带笑。有一次散步,她谈起当年高考落榜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幸被曲师补录,第二次考研也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因此对母校心怀感恩之情。

薛其坤院士亦曾在曲师任教。1984年7月,他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来曲师报到,我在同一天毕业离校,虽失之交臂,但也听说过其不少轶事。三战考研成为传奇,最终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取得多项引领性的重要科学突破,首次发现堪称诺奖级成果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当时,学校还有一批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也都有名士风范。像著名书法家包备五,清华大学毕业的庄上峰和留美硕士李毅夫,宋词专家刘乃昌、唐诗专家李季平、儒学专家骆承烈、《齐鲁学刊》主编徐文斗等知名教授,皆曾执教于杏坛。聂建军、朱光灿、魏绍馨、张忍让、戴胜兰、徐振贵等老师还给我们上过课,都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名师;还有后来的戚万学、曹莉等一批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尤其是1970年至1974年,山东大学文科迁来曲师合并成为新山大、冯沅君、萧涤非、袁世硕、陆侃如、蒋维崧、高兰等一批著名学者也在此执教,留下了很好的教风。一个偏僻县城的大学,能够有这么多名硕大儒,充分体现了曲师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首任院长高贻非先生,就是一位当世名儒。曾师从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先生研究儒学,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院。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当选为滨海根据地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济南市教育局局长。1955年,出任山东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为纪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国务院决定将山东师范专科学校从济南迁来曲阜升格为本科高校曲阜师范学院,其任命书是周恩来总理签署。

1956年,高贻非院长率领师生迁址曲阜,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曲阜西郊的一片田野里创办曲阜师范学院,并创立了全国第一所孔子研究会。我们当年上课的西联教室,是一排苏式风格的建筑,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和欢乐。

曲师老书记王路宾同志也是一位老革命,1930年入党,曾任国立山东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参加过“一二·九”运

历险记

滋修堂主

块雨点般砸向冰面。可谁也没有察觉到,此时,冰面已经出现裂缝,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见石头已经用完,我抢先下到冰面去捡石头,一回,两回,第三回的时候,脚刚踏进冰面,哗啦一声闷响,冰面塌了!瞬间,我掉进了刺骨的冰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我机灵地一转身,一把抓住了岸边一棵枯死的勒丝草,大叫着喊救命。小伙伴们一时都惊呆了,抑或是吓傻了,无人敢上前应对。

就在我无望的哭喊声中,千钧一发之际,恰好父亲几人去给果业队的苹果树追施冬肥,途经此处,听见喊声,循声跑来,拉住我已经僵硬的通红的小手,拽上岸来。

此时,我已经被冰水湿透,冰水顺着裤腿向下流淌,浑身打战,狂哭不已。父亲又急又气,猛踹了我几脚,拉起我回了家。

时值凛冬,农家的炕头却是热的。母亲一边责骂,一边帮我脱下沉重的棉衣棉裤,将我安置在暖和的被窝里,让暖流驱赶周身的寒气。一连好多天,我始终躺在被窝里,直到棉衣棉裤被重新拆洗、烘干,又重新缝制完成,才又高兴地上穿上翻新的衣裤上了街。见了小伙伴,见到熟悉的街巷,那种久违了的感觉,真叫一个爽!

转过年来就要上学,村小学的郑老师上门摸底家访,摸着我家红扑扑的小脸

蛋,说:“这小家伙,虎头虎脑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父母本来还因这场生死变故而在惊悚之中,闻听此言,扑哧一声都笑了,似乎真的有洪福要降临这个贫弱的农家。

18岁那年我如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很大的新闻机构,15年后成了下属一家子报的总管。由于生存艰难,不得不硬着头皮四处求人化钱。那年盛夏,联系妥了一家大企业,准备搞发行合作。坐上报社那辆已行驶40余万公里且换过发动机的老爷车去胶东,高速行驶至潍坊市坊子区路段,车辆突然爆胎!幸亏司机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十几年的老司机,十分沉着地握紧方向盘,缓缓踩住刹车,将车稳稳地靠在了路边。同行几人皆满头冷汗,许久还未从惊悚中缓过神来。

如果这是一次旅行小插曲的话,那么一场翻车事故,则让我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十分侥幸地滚了回来。

将近20年前吧,我所在报社与省直一大系统联合开办新闻培训班,地点在贵阳。在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新闻业务讲座之后,众人乘坐大巴车慕名前往黄果树瀑布参观考察。贵州的山,多陡峭;贵州的路,多崎岖。行至一大下坡拐弯处,万万想不到的是,刹车突然失灵!司机还算判断冷静:往左,就是悬崖峭壁,必死无疑;往右,是山体,山体下面是农田。司机并未犹豫,方向盘往右猛地一打,大巴车瞬间跃过路边的

沟坎,冲进了地里。可怕的是,地里净是石头,当车辆侧翻在田地里时,有两个人当场从开着的玻璃窗内飞了出去,距离裸露的石头,近在咫尺!我则因为坐在最前排,眼瞅着车辆运行轨迹的遽然变化,目睹了司机的紧急处置方法,双手死死地抓住胸前的不锈钢栏杆,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波将我狠狠地甩到了前挡风玻璃上,一时失去知觉。

大约几分钟后,自救行动立即展开:有拖伤员的,有扒门缝救人的,有拦车喊人的,大多数人则默默而痛苦地忍受。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被旅行社派来的新大巴车就近接去了一家乡镇卫生院,在那个还算干净却极其简陋的屋子里得到简单的包扎治疗后,不得不转去设在凯里的黔东南自治州医院。在这里,一车人共同度过了一段令人生难忘的治疗与互助时光。所幸,全车人均无大碍,经治疗,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开启了各自新的人生之旅。但这份深刻的记忆,却像影子一般追随着我的余生。

经历过这几场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我对人生的思考上了一个崭新的起点:活着,什么都好;亲人,什么都重要;生活,平平安安就好;财富与地位,那只是人生的附属品,没有它,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如常人般美好。

是的,人生海海,不过尔尔。

文荟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曲师求学的。学校位于孔子故里,圣地学府,自有圣贤遗风。当时,学校有不少名硕大儒,尤其是几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师,至今印象深刻。

古典文学老师张元勋,是当年高考状元、北大才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落实政策后来到曲师。学校担心其学业荒废,让其当场试讲一下。毫无准备的张老师竟脱口背诵出《离骚》全文及注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满堂震惊。《九歌十辨》专著一出,奠定了其楚辞研究的一席之地。

是真名士自风流。张老师性情洒脱,豪放不羁,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讲起课来声情并茂,神采飞扬。有时诗兴大发,兴之所至,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一次,张老师到孔庙现场教学,其解说妙趣横生,把游客和导游都吸引了过来。

当代文学老师孟蒙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学生时代即参加地下工作,被誉为“少年英雄”。抗大毕业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5年在《山东文化》发表中篇小说《硬汉》,轰动解放区文坛。后来蒙受不白之冤,落实政策后来到曲师。孟老师身材高挑,面庞清癯,满头银发天然卷曲,常戴一条长围巾,气质儒雅,风度潇洒。讲起课来激昂慷慨,大有五四名士之遗风。

在孟老师的影响下,我和几位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杏坛文学社,编辑出版了《青果》《仲夏》等文学期刊。孟老师担任顾问,亲自为社刊作序,成为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毕业后回过母校,看到“杏坛文学社”的招牌依然挂在那里,感到特别亲切。

在曲师,还有一位怪教授陶愚川。同学们经常在阅览室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戴着瓶子底厚的近视镜,手里拿着个放大镜,默默地研读外文期刊,那就是陶愚川先生。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赴美攻读研究生,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因其兄陶百川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便被下放到这里,历任历史系、外语系、教育系教授,是当时罕见的二级教授。

先生平时不苟言笑,三天不说一句话,性格孤僻,不谄世事,终生未娶。常年端着一个掉了瓷的大茶缸在食堂排队打饭,有人劝他买点鸡蛋煮煮吃,他竟问怎么煮。偶尔也会到曲

有滋有味

平生最敬佩的人,当属置生死于度外的人。少年时代是古时候的贤达,稍大些是课本上的英雄,大学时是老山前线的战士。今天,和平年代,人心向善,面对险情为了他人而奋不顾身的英雄好汉已不常见,但还是有些在人生变故突袭而至却把生死不太放在心上的人,比如我的大学同学李君,罹患肺癌之后仍笑容满面,与同学欢聚满杯畅饮,旷达、豁达,我佩服。

我也经历过几次险情,甚至是生死。在当时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心理与生理考验,是一劫。而今回忆起来,不过小菜一碟,一笑了之。

我八岁上学,上学的头一年每天还在疯狂地玩耍:春天,在野花盛开的茅草地里拨弄野泽(茅草开花前的花朵幼苗,拔之可食用,味甘);夏天,在村北头的水库里游野泳、捉泥鳅;秋天,在连片的青纱帐里玩捉迷藏;冬天,在结冰的水面上打滑溜溜儿(滑冰),时常满身泥土、一身臭汗回到家,挨了训、招了骂,吃完饭、嘴一抹,又开溜了。

险情就出在这一年的冬天。村东头有一泓碧波,我们俗称东大湾,因为源水不断,一年四季绿水汪汪,冬天则冰封河面,正好用来滑冰。某日,三五玩伴来到湾边,打算换一种玩法,由我提议:今天不再滑冰,改用石头砸冰,看谁能最先砸开冰面。于是乎,小伙伴们四处寻找石头,一会儿,大大小小的石